

# 独立阅读

2008 年 12 月

##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写作：戴新伟（广州）、朱白（广州）、罗四鸽（上海）

经济：苏小和（北京）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一（成都）、成庆（美国·波士顿）

**特约撰稿人：**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莫之许（北京）、吴强（德国·慕尼黑）、张昕（美国·洛杉矶）、刘柠（北京）、汪伟（上海）、沈展云（广州）、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曾园（昆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程明（济南）、马庆（上海）、张无极（北京）

**翻译：**陈丹丹（南京）

## 编者按：

阅读的本质是什么？每本著作或者每篇文章都有其特有的知识领域和关切，对于人文世界而言，我们日复一日的积累这些领域的信息，大多其实并无法成为我们的研究范围，那么阅读本身是否就可以只是为了阅读，抑或，还有什么更多的深意？

作为编辑，每期阅读《独立阅读》各位作者的文章是幸福的，这并不只是在于他们总是让编辑发现一些所未见过的新奇，而在于通过这些性情文字，分明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关切社会，磨砺心灵。或许，《独立阅读》最大的财富，是在于我们拥有的一个基本共识：阅读是一种心灵的沟通，而非仅是知识的传输皮带。

鉴于《独立阅读》月初出版，月底发行的“习惯”，这里先预祝各位新年快乐！

一晃已近 2009 年，时间总是过的太快，中国却总是变得太慢。

## 目录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写作：朱白

经济：苏小和

文史：王晓渔

音乐：成庆

###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

刘柠：媒体何以成为战争协力者

严飞：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

孙骁骥：“奇趣”文学手册

### 书评

---

戴新伟：与书店有关的日子

张无极：邮差敲响时光之门

朱白：眼下，正是看公仆干好事的时候

羽良：寻找民主化的条件

### 随笔

---

苏小和：北岛的母语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WRITING 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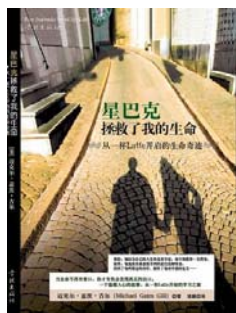
观察员 朱白 (广州, zhubai@tom.com)

金融海啸继续折磨着全球,如果说前一阵子还是隔岸观火,那么如今大家已经渐渐开始有了切身感受。很显然,金融海啸,不仅仅是金融遭受危机,我们生活中很多方面都开始受到牵连。所以,不管是最近的新闻还是各种有识之士,都开始关注 2008 结尾之时的这场金融海啸。不过要我说,如果仅仅金融海啸,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所有人绑在一起,往坏里想,即便没有网络、电视了,也没什么,古代人没有这些,不能说现在的人就比古代的人幸福了。可怕的是,当所谓海啸来临之时,我们整体暴露出来的问题,呈现出的各种顽症,如果一场金融海啸使之更加严重和凸显,到了非要解决的时候,那种真正的有力量的海啸才可怕。

此时,广州,虽没有北方的严寒,但已然可以感受到冬天。一场金融海啸让我们进入冬季,这是现实,容不得你撒娇或者质疑。冬天,使空气变得寒冷,可同时,这也是我们感受温暖的时候。比如说,当你从寒风中走进温暖的卧室,那种温暖就是非冬季不能感受到。

季节、时代都可以有冬季,人生也一样。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恋情的终结》(柯平译,译林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版)中描写了一个从爱情降临的喜悦到恋情高潮,从恋情的高潮再到几乎不可避免的嫉妒,最后高潮处戛然而止,“恋情终结”得没有气息,仿佛人生冬季般的寒冷。这是一个作家“非常自传性”的故事,因为很多细节都可以从作家的生活中考证出来,不过,还是不要将此当成传记来读,一个简单不过的常识是——你会相信一个小说家吗?作为一个虚构故事的高手,格林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故事,通过想像力使之成为一部作品,这是作家要干的事,所以那些企图从小说中读出作家本人八卦的人应该歇歇了,即便你出于热爱作家而喜欢玩味这些,也不要拉大旗作虎皮地吓唬人,好像格林真的会在小说里泄露什么个人隐私一样。爱情是格林这部作品的主题,男人的情欲及其狭隘心肠,格林非常讨好并生动地坦白给读者。除了“爱情”这个古老而平庸的话题在格林笔下熠熠生辉以外,这部小说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作为描写作家的一部作品,《恋情的终结》充满诚意,一个作家的困惑、焦虑,以及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在他们的笔下都得到了真实流露。如果说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和他本人是在一种相互纠缠和影响下产生化学作用的话,那么当他试图刻画自己、审视自己,将自己的肉身和精神写在纸上时,他们的文字已经产生了某种力量——文字生活,这是作家与其作品互相影响下的结果。

顺便说一下,译林出版社同期出版的格林作品还包括《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恺蒂译)、《人性的因素》(韦清琦译)、《哈瓦那特派员》(吴幸宜译)、《问题的核心》(傅惟慈译),同样值得关注。个人不觉得格林的小说多么迷人,但作为上乘的小说,它们有熟练的技术和精准简练的语言,这些已经足够吸引人的了。这大概也是格林小说得以畅销并长销的原因之一。



除了可以温暖人心的爱情故事以外,在这样一个多少让人感受无助的冬季,还有励志小说可以看。跟路边卖的大多数盗版励志书不大一样的是,《星巴克拯救了我的生命》(迈克尔·盖茨·吉尔著,诸颖译,学林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版)用平凡的语调和坦诚的告白讲述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故事的讲述者有着从上到下的经历,如果说你曾相信“上上下下的快感”的话,那么当一个人的生命到了 60 岁要面对工作、亲情、生活的全盘崩盘时,则可以让你彻底背叛这样的话了。崩盘自然有崩盘的痛楚,但不见得这样的人生就没有什么回味。奇迹的是,在作者盖茨·吉尔看来,这样的人生恰好可以激励那些面对这个时代感到困惑和无助的人。谁说人生不是处处皆风景呢?从世界第一大广告公司的高层位置被辞退,紧接着是人生的低谷,离婚,失去一切财产,新的生计惨淡经营直到无法维持,这个五个孩子的父亲,走进一家咖啡店,不是来喝咖啡,而是带着怀疑从一个端咖啡的接待员从重新开始……值得一说的是,作为一个有如此传奇经历的人,盖茨·吉尔有着良好的叙事才能,复杂的故事在他的清晰讲述下,阅



读不存在障碍，难以想像一个一生跟文字没多大关系的人能有这本事。书中提到过他父亲是《纽约客》杂志的重要作家，还写过一本《在〈纽约客〉杂志》的畅销书——原来人家是世家。出于个人偏见，我将书中一些过于“文学”的地方看成是这本书的原出版编辑所谓“润色”之功，因为这些文字跟朴实的故事比起来，的确显得画蛇添足。如果这些地方恰巧是作者本人所为，应该属于败笔。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赢家让-马·居·勒克莱齐奥的书，在这个月成为热门书并不意外。当我们除去浮躁和跟风真正来读这些书的时候，也许会发现一些真正跟文学有关系的东西。比如，勒克莱齐奥真的是一个能将美和人类灵魂写进故事里的作家。《诉讼笔记》（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版）作为作家的处女作，显示出了超强的才能，首先他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将自己的诉求用非常之文学的方式铺展出来，然后你似乎又能从作家的精巧叙述和宏大理念中看出，他真的是从一开始就冲着经典去的。这样说，当然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不过在停止喧嚣之后能与勒克莱齐奥这样的作家亲密接触，应该算是一件好事。相对来说，他的《金鱼》（郭玉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版）则显得有些简单，故事里的躲避人类丑陋而又不及的金鱼小姐，总是要饱尝人间酸楚，她的一生经历仿佛就是证明人类之丑陋。

在这样的季节，最不该读的就是《忧郁星期天》（巴科夫著，林敏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这种书，仅凭这个名字，就容易让人添堵；如果你稍有音乐常识的话，就更容易进而产生悲观情绪了。这首气质忧郁的钢琴曲，曾经像神话故事一样风靡当时的社会。而所谓“当时”，正是二战期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这首优美迷人曲子，结合战争期间的恐怖气氛，据说在当时令听者闻后便想到自杀。一首曲子引起自杀风潮，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但曲子本身又是美的象征，是什么使人们笃定信念生不如死的呢？这部小说正是根据这首曲子的相关人和事写成的，作者无需面面俱到地像破解谜团一样叙述这部小说，他跟读者一样，只是用一些细节试图证明传奇之所以传奇。关于“忧郁星期天”（以前大多是以“黑色星期天”的名字流传的）其实又是一个音乐、小说、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互动的话题。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布达佩斯之恋》唯美、好看，女主人公那头黑红的长发和那双迷人的眼睛，足以让电影观众再多一次长吁短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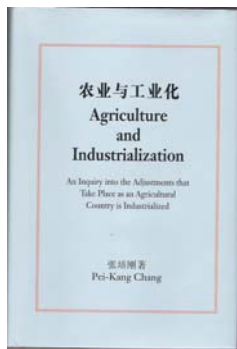
人总是容易犯下这样的错误——在某些方面自信，但其实这种自信却可以让你蒙住眼睛。比如我总觉得凭着自己对图书的关注，应该不会错过那些值得拥有的好书，但事实不是这样，最近我就遗漏了两本书：《活埋蓝调里》（弗莱曼著，高晓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7 月版）和《老美国志异》（马库斯著，董楠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这两本书对于我来说，是那种在如果一个月只有 50 块钱买书的时候也会买下来的书，别说错过，就是迟到些时候看到也会心里痒的要命。之所以对这种书有这种奇特的感情，甚至不是因为这些书写的好，其重要理由是因为匮乏。一直以来，对于介绍国外音乐和电影的书，屈指可数，即便近些年来我们有眼光的出版社已经开始做这样的引进，可是和台湾比起来，我们差的还很多。所以直到现在我也羡慕当年家中摆放几十本台湾远流出版的“电影馆”的那位朋友。《活埋蓝调里》是历史上大概最有说服力的摇滚女星珍妮丝·乔普林的传记，她是那种天生的艺术家，这一点她跟吉姆·莫里森一样，他们是危险的、艺术、天生的狂徒，是这个地球上某种意义上来说最极端的物种，用火点燃肉身，这种事只有在他们这样的人身上发生，我才不觉得矫情。这是美国 1960 年代“大文化思潮”奉献给全世界的最牛逼的音乐家和艺术家，我们这些后人不必哀怨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时代、那些场景，在今天之异国他乡可以跨越时空面对如此不朽的艺术，已经算是幸运了。乐评人格雷尔·马库斯的《老美国志异》写的则是鲍勃·迪伦在 1967 年发生的故事。说起来，关于这位名气滔天的音乐人的文艺作品已经很多了，除了不用说的音乐以外，仅在中国能看到的就包括自传、传记等书，还有 DVD 传播的演唱会实况、传记、传记改编的剧情片，似乎可以这样说，鲍勃·迪伦应该算得上在中国最经得起传播和销售的音乐家了。直到今天还能让人产生追随愿望的，大概除了约翰·列侬，就只有鲍勃·迪伦了。这部传记，集中展现 1967 年鲍勃·迪伦与地下室录音带的故事，书的原名也正是叫“看不见的共和国：鲍勃·迪伦的地下录音带”。

冬天，尽管忧郁，但却可以看成春天来临前的必经之路，如果将之看成是一种必然，此时的我们会不会好受一点？对于根本意义上渺小的人类来说，遥想一下未来的春天，大概是我们最可以做的事情了。



##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这一段时间,我淘到了几本好书。准确地说,是几本不错的由中国人写成的好经济学书。

首先是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花千树出版社),一本英文版的经济学著作。不过,书的前面,刊载了张培刚先生的一篇口述,题为《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紧接着培刚先生还写了一篇中文简要《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两篇文章加在一起,极具史料价值,同时也让内地诸多经济学后辈多了一份中文阅读体验。

张培刚何许人也?想来大多数人完全不知。先看张五常给培刚先生写的简短序言:

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 *ragnar nurkse* 一九五三年出版的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 *nurkse* 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

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能让张五常喊上一声大哥的经济学家,这个世界上恐怕不多,而华人经济学家里,绝对只有张培刚先生一人。这不是因为培刚先生年事太高,而是因为他绝对是华人经济学家队伍里最早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师。先生的博士论文于 1945 年在哈佛大学用英文写成,1949 年在哈佛大学出版,这次是第二次重印,也是第一次在华人世界里印行。该文获得过 1946 年-1947 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 (*David A. Wells Prize*),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 85 卷。1969 年在美国曾经再版,1951 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培刚先生本人则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

一个早年就拥有极高学术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后来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这显然又是一个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故事。1946 年,培刚先生应武汉大学校长周炳生邀请,担任了两年的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1948 年受聘去联合国工作,但 1949 年却辞去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研究员职务,又谢绝导师张伯伦、布莱克、艾谢尔要他回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再一次回到珞珈山下任教。这一私人决定,让张培刚从此远离经济学研究,之后,他在华中工学院从事了 10 年的基建和总务后勤工作,10 年的政治课教学,10 年的上山下乡体力劳动,受审查,挨批判。期间,曾经有两位智利经济学家来华访问,下飞机就要见 *Peigang-zhang*,翻译一头雾水,听成了“背钢枪”,后来经北京大学严云庚教授提醒,才知道是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的张培刚。这个时候的培刚先生贫寒交加,一家人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家徒四壁,没有一本经济学的藏书。领导上碍于面子,只好把培刚先生一家人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里,并搬来一些经济学术,装点门面,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叙述这些并不久远的读书人故事,我禁不住眼泪。一个国家就是如此对待它的知识分子,我们除了悲伤,还能够做些什么?

如果说张培刚先生的悲剧具有浓厚的经济学学院色彩,那么杨伟名的经济学悲剧,则具有醒目的民间色彩。我在万圣书屋淘到了他的遗作《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2 月出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陕西农民,在 1959 年到 1962 年全国一片大跃进的癫狂中,多次上书,反映农村问题,怀疑大锅饭、大跃进的计划经济模式,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之后不断遭受迫害,不看屈辱,服毒自杀,享年 46 岁。卢岳刚为这本书写了“不平常的追悼”的序文。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农村改革的学者来讲,是一本难得的史料。如同杜润生老所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者不是某个组织,也不是某个经济学家,而是广大的中国农民。如此看来,杨伟名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卓越经济学勇气的、一直走在时代前面的有思想力的农民。

杨伟名文存今天能够跟我们见面，事实上还是一个禁忌。我不知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个版本是不是也遭到了限制，万圣书店把这本书放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我经常去看，曾经在这个角度里淘到了林昭，也淘到了王力雄。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写了一本看上去很不值一提的小书，大概意思是将建国 60 年以来的一些人的个体命运进行了某种另类重构。想不到各大出版社大惊失色，纷纷反应过于敏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说暂时可能没有出版社有胆量出版，三联说他们已经收归某某部，这样的书恐怕也不敢造次，中信出版社以经管书见长，他们倒是愿意出版，但提出必须修改。无奈之下，我找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刘瑞林女士做了长谈。感谢刘老师，她对我的书进行了热情鼓励，临别之时，还从自己的藏书柜里拿出一本显得稀罕的书送给我，我看了，竟然是一本黑色的《杨伟名文存》（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2003 年 1 月）。刘老师告诉我，当时这本书还来不及上市，就被封存，销毁，所以，送给我的这本黑色小书，显然就很有收藏价值了。在此谢过刘瑞林。



让人难过的事情说得太多了，最后来点开心的吧。

中信出版社出版了陈志武的两本书《非理性亢奋》、《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2008 年 10 月出版）。熟悉陈志武教授的读书人很多，他是耶鲁的终身教授，常年围绕中国经济话题发表真知灼见。这几年我读经济学，志武教授的思想，是我的阅读路径之一。我从他的文章里受到的教益太多，以至于无以言表。窃以为，华人经济学家中，真正具有深厚经济学体系，同时又能看透中国经济社会本质的学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已经去世的杨小凯，一个就是陈志武。这显然是我们读书人的喜讯，有陈志武在，我们的经济学视野就会持续开阔，我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也会不断得到加强。这当然也是陈志武教授个人的快乐所在。至少和张培刚相比，今天身居海外的陈志武，已经被众多中国读者熟知，他的思想，已然成为部分中国人阅读、思考和行动的参考。这就足够了，虽然我知道目前的管理层并没有几个人真正能把陈志武教授的话听进去，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真正的经济学永远都是一种教育的工具，启蒙的工具，只有那些财大气粗的暴发户，才把经济学当成发财的筹码。让我们感谢陈志武教授，他让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的终极指向，是个人的权利与幸福。由此我们第一次知道，生活在这个纷乱的时代，纷乱的国度，坚守自己的权利，坚守自己的自由创造，我们才能抵达富有，才能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由。

##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美国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奥巴马以他的奇里斯玛征服了美国乃至欧洲。在一个祛魅的时代，奥巴马的超凡魅力是对政治生活的招魂，唤起选民的巨大热情。也有一些人对此保持距离，曾经参与希拉里助选团的龚小夏，在希拉里宣布退出竞选之后，没有紧密团结在民主党的周围，毅然“叛党”，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她表示：“看到狂热的年轻人和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类似群众运动的东西，我是本能地要躲开。”（《南方人物周刊》2008 年 11 月 21 日）这让我想起民国报人杜亚泉的一段话，他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里指出，游民阶级和智识阶级之一部分结合，与贵族阶级抗争，革命之后再次建设贵族政治，“故此等革命，非政治革命，亦非社会革命，只可谓之帝王革命而已。”他们都看到了狂热分子和知识精英结合成乌合之众的危险，龚小夏的忧虑属于未雨绸缪，杜亚泉的感慨则是痛定思痛，但他们都对民主和宪政抱有基本的尊重。总统是靠不住的，正是如此，才更加需要民主和宪政，文化批评网（[www.21whpp.com](http://www.21whpp.com)）在评述陈水扁入狱事件时，用了这么一个标题《只有靠得住的民主，才能铐住靠不住的总统》。龚小夏的《驴象庄园：美国总统是如何产生的》（法律出版社，2008 年 9 月）清晰地呈现了美国选举政治的方方面面，告诉读者“驴象庄园”和“动物庄园”的区别。不管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当选，美国都不至于成为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对此我比较乐观。



对于异国他乡的总统选举，我们只能临渊羡鱼；对于异国他乡的次贷危机，有人不仅隔岸观火，还动了趁火打劫的念头。最近看到不止一篇文章，兴高采烈地从美国的次贷危机推导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再推导出政治自由主义的破产，

进而彻底否定普世价值。我于经济学是外行，但凭借常识，我不相信次贷危机等同于普世价值危机。如果说普世价值存在危机，那不是因为它被普遍接受，而是它被普遍接受的程度还远远不够。美国学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的《捍卫全球化》（海闻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对针对全球化的几乎所有重要质疑一一作出回应。全球化会加剧贫困、增加童工、威胁本土文化、破坏环境，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批评，巴格沃蒂通过研究发现，“全球化常常有助于解决人们归罪于它的很多问题”。以电影为例，他指出用电影配额以及类似的方法来限制贸易的政策根本不可行。我们对此深有体会，如果对好莱坞大片的配额限制，是为张艺谋的《英雄》、陈凯歌的《无极》保驾护航，这种所谓民族电影还不如不存在。更何况，张艺谋和陈凯歌也要寻求国际市场，不可能拒绝全球化。《捍卫全球化》倾向于单刀直入，有时显得不够辩证，但是看多了辩证文章，看到这种风格的著作反而有些亲切。



陈志武先生是我比较信任的华人经济学家，他同时推出《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和《非理性亢奋》（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也是贯穿于我的阅读和写作生涯的问题。从识字开始，我们就被教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敢，但让我不解的是，既然同时拥有天时、地利和人和，按照常理，中国人应该可以享受生活，可是我们同时又被教育人民具有吃苦耐劳的美德，仿佛人民天生热爱吃苦耐劳。虽然我和陈志武关注的领域不同，可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我高兴地发现不仅我们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而且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回应有着同样的共识。陈志武在谈论经济问题的时候，不断强调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他认为“开放的媒体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机制”，他还指出更多的法律不等于更好的法治，关键是“法律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和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

2008年11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是“30年企业思想家”专辑，从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可是这种思考又是远远不够的。任志强告诉特约记者（也是“独立阅读”的观察员）苏小和，他正在阅读《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和《身份的焦虑》（阿兰·德波顿著，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身份的焦虑》是不算好也不算坏的心理鸡汤，这里不去说它，但是这个标题恰恰说出了任志强以及当下中国企业家的身份危机。杂志刊登了任志强站在书架前的照片，书架上大多是实用型书籍，与思想没有什么关系，只能辨认出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还有一本疑似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6月），加上《乌合之众》，思想类书籍非常有限。从书架来看，很难称得上是企业思想家，或许可以说是企业思考者。但不管思考是否成熟，能够思考已经非常难得，在当下的企业家（不仅是企业家）里，有着太多的“权力崇拜者”，一边打民族牌反对所谓西方强权，一边把本民族的强权者奉为圭臬。企业思想家要从一百年前开始追溯，傅国涌先生的《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讲述了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的往事。傅国涌指出近代民营企业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过去常说的外资企业和外国产品，而是来自官资和官企兼并的威胁。实业家成为推动立宪的中坚力量，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光荣历史，不能被遗忘。如果不从“动物庄园”走出，企业家做得再快、再高、再强，也是没有未来的，都只是为“动物庄园”添砖加瓦，最终把自己也囚禁起来。



马克斯·韦伯的《伦理之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是《学术与政治》的一种译本，或许考虑到这是韦伯的演讲，这个译本比较注重口语风格。值得一提的是译者王容芬，因为在1966年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在监狱度过13年青春。一个19岁的女孩，发现了“动物庄园”的秘密，她的幸存已经是万幸。更多的中国文人习惯于隐身于“私人领域”，在中国的古典文化里，园林以及园林里的玩好诸如奇石、珍禽和名画，是世外桃源。然而，这种诗性审美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并且变形，杨晓山先生的《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讲述了“变形记”的过程。见到这本书的标题，推测与宇文所安有关，打开一看，作者是宇文所安的弟子。间或阅读这种典雅的文字，可以祛除面对现实的戾气，调养生息。

## ARTS 音乐

观察员 成庆 (波士顿, [veron.cq@gmail.com](mailto:veron.cq@gmail.com))

12月的波士顿，冬意萧瑟，圣诞将至，奔走于交响乐厅(Symphony Hall)、乔丹堂(Jordan Hall)以及散布在剑桥与布鲁克林的各个教堂间，耳目之间，皆是17、18世纪作曲家的曲目，比起亨德尔的终老伦敦，苦守其歌剧大业，以及巴赫驻扎莱比锡二十三载，奔波于教堂礼拜服务而言，今日的波士顿人似乎要幸福许多。不过人生格局，荣辱苦乐，本在人心一念，冷暖自知。谁又能真正明了亨德尔与巴赫无远弗届的境界，我等常人，唯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临近圣诞，亨德尔的《弥赛亚》(Messiah)自然是保留曲目。初来波城，每见《弥赛亚》的节目预告，就几近雀跃，不能自己，时间一长，却发现一入12月，几乎家家都会演出这一曲目。忆起数月前的的心情，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本月我选择了两场，一场是创办已有155年之久的亨德尔&海顿协会(Handel and Haydn Society)在交响乐厅的演出，另外一场则是个人钟爱的波士顿巴洛克(Boston Baroque)在乔丹堂登台献艺。

谈起亨德尔这部红遍西方的《弥赛亚》，爱乐者自然相当熟稔，霍格伍德(Christopher Hogwood)写的《亨德尔》一书，开篇就引用西谚，“人们不能老是在赞美荷马”，以此影射亨德尔在西方世界所笼罩的神话般的形象。如果深入亨德尔的生平，这位与巴赫同年生的德国人，居然在英国爆得大名，但是却因歌剧院难以为继而穷困潦倒，不再写作任何歌剧。但是詹宁斯(Jennens)根据《旧约》和《新约》所写的唱词却让他能在短短三周的时间内，完成这部传世清唱剧，甚至詹宁斯还因此颇为不满，认为亨德尔没有花上一整年的时间进行配乐，并且批评某些片段根本不适合他为《弥赛亚》所写的唱词。



关于这个写作过程，也曾激发起不少作家的浮想联翩，茨威格在其《亨德尔的复活》一文中，就将《弥赛亚》的作曲过程描述为亨德尔精神醍醐灌顶、“复归于婴儿”的转折点。事实上，《弥赛亚》的确是亨德尔作曲的一个分水岭，是他精神世界重大转变的的见证，由荣至衰，亨德尔定是了解荣辱不惊的信仰含义。



抛开这些历史细节，仅仅从音乐本身来讲，三部分分别讲述的是耶稣诞生、耶稣复活以及弥赛亚降临的圣经场景，整部作品基本上洋溢着歌颂荣耀的明朗色调，就算是唱到第二部分的“他为世人遗弃，整日与悲伤苦痛相伴”，也最终是以“哈利路亚”宣告耶稣复活的喜悦而结束，或许对于彼时的亨德尔而言，“再生”是一种欣喜，是沐浴在上帝恩典下的荣耀，忧伤势必过去。

亨德尔&海顿协会在交响乐厅的演出并未让我感到兴奋，这一方面是因为可容2000人的音乐厅，和30人左右的合唱配置相比，颇为寒碜，亨德尔在都柏林的首演，动用了26人的合唱配置，但是都柏林的音乐厅挤得满满，也才700人。所以就连“哈利路亚”一起，我坐在二楼靠近舞台的长廊里，也未感到强烈的声场气势，感动更是无从谈起。四位歌手的演绎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觉得欠缺一点，是什么？我无从知晓。

几天后的波士顿巴洛克的演出，转移到乔丹堂这个小剧院中，而且我的座位靠近前排，可以仔细观察乐队与合唱团的表现。指挥 Pearlman 同时担纲古钢琴演奏。开场“Sinfony”一起，我几乎就被那特有的巴洛克音色裹挟而去，那是18世纪最后的巴洛克色彩，温暖且感人。而且波士顿巴洛克擅长将音色演奏出一种丝绸般的色泽感，几如温暖之手不停拂动人心，这不就是我等待的“弥赛亚”吗？

序曲完了，便是宣叙调“上帝有言，安慰我的百姓”，小个子男高音詹姆逊初开歌喉，虽无惊艳之感，但是却透出平实温润。接着粉墨登场的男中音迪斯是位黑人，气势不凡，但是却有点异军突起之感，将前面铺成的暖意加入些许雄浑，但是气韵却略微和前面不搭。

不过这只是微不足道的瑕疵，ALTO由多纳克这位男士担纲，初听并不习惯，但是他却能唱的柔情百转，“谁能承受他来的日子？”我心中在隐隐作痛。

接着“他将洁净利未人”已经扑面而来，SOPRANO\ALTO\TENOR\BASS四个声部的层次非常清晰，你可以清楚地把握各个声部如何互相呼应、汇合、转化的，但是彼此又不疏离，将人声的丰富变化表现殆尽。如今回忆，当时的我，心



中热情翻滚，几欲开口与其共唱。为何这段于我有如此大的催动，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

从当天来看，**Pearlman** 全曲指挥的节奏稍快，甚至显得轻松活泼，他们当然有足够的自信，毕竟这一曲的录音还曾获得过格莱美提名。而且当夜在乔丹堂里，弥漫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氛围，这种特殊的魔力，可谓是波士顿巴洛克的特殊魅力所在。

12月同样也是巴赫的季节。

波士顿西西里亚(Boston Cecilia)演出 B 小调弥撒 (Mass in B Minor), 于我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有机会聆听这一长达两个小时的作品，恐怕并不容易遇到，毕竟演出它既费力且难讨好，除非那种专注于巴赫作品的演出组织，否则不会轻易涉足，而那日三分之二的上座率，已经反映了巴赫尽管伟大，实际上和者寥寥的现状。



为什么这部作品重要？事实上，巴赫只是生前将各部分收集起来分为四部分，分别是 1) **Missa**(垂怜经与荣耀经)，2) **Symbolum nicenum**(信经)，3) **Sanctus** (圣哉经) 与 4) **Osanna**(和散那)，**Benedictus**(降福经)，**Agnus Dei** (羔羊经)，垂赐平安 (**Dona nobis pacem**)。这部以天主教弥撒形式写成的弥撒曲，也无法在当时德国的路德教堂演出，巴赫显然写作此曲另有深意。按照如今巴赫许多研究者的普遍看法，巴赫此曲是对其作曲技巧的实验，由此他才会罔顾是否上演的现实阻碍，为音乐本身而作。

再说下去，我既无能力，也不可欲，毕竟这部作品本身对我而言，尽管聆听数遍，但是仍然是个谜，我所看到的吉光片羽，仅此我的一瞥而已，如此巍峨的宫殿，何时才能知悉它的奥秘？

进去找座位，竟然发现是第一排，与乐队如此近距离，让我开始很不适应，清楚地看着小提琴与大提琴手的运弓，对听音乐反而产生了极大的干扰，直到荣耀经开始，我才逐渐缓过神来。不过第一小提琴手所拉的音色清晰入耳，温暖而富变化，不坐如此近，也难以观察这样的细节。

这里不对细节多着笔墨，扼要言之，大提琴与小提琴部分表现相当出色，尤其演奏卡农时的前后追随，音色高低变化，充满着色彩，如 **Domine Deus** 一曲的长笛起音与小提琴的跟随，悠扬与婉转相映成辉，以此来写荣耀经的“上帝我主”，让人如何不心生崇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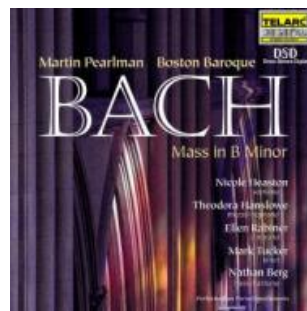
男中音 **Martin Near** 与男高音 **Thomas Cooley** 让我印象颇深，两段咏叹调均唱出绕梁不绝的意味，不过或许是因为我坐第一排，对合唱效果的整体感缺乏体察，这或许是一个遗憾，只能回家猛听里希特的录音解瘾。

每次听完此曲，总觉得一个宇宙悬于心头，每当我试图去窥探一面，发现的总是无限，很明显，巴赫是在用一种我今日仍然无法理解的乐思来进行写作。

相比而言，巴赫的康塔塔要轻松不少，毕竟这些大多数只是为例行的礼拜而作，而且巴赫还写出一大堆世俗康塔塔，以供娱乐。比如 **BWV211** 的咖啡康塔塔，无非就是讲个父亲劝导女儿戒除咖啡的趣事，甚至不惜以郎君相诱，女儿虽对色诱心动，却仍然挂念心中的那杯咖啡，以致于康塔塔的结尾处，巴赫甚至写下“猫改不了捕鼠，少女仍然心牵咖啡”的词，让人忍俊不禁。

因圣诞之故，亨德尔&海顿协会专门演出一场“巴赫圣诞节”，其中的“荣耀归于主”(Gloria in excelsis Deo, BWV191) 是为圣诞日所写，而这段曲如今为人所熟知的是在 B 小调弥撒中“荣耀经”的开篇，“荣耀属于天地之主”，以致当旋律开始，几欲只把此曲当“弥撒”。

当晚另外一曲“幸福慰藉，我的基督降临”(süßer Trost, mein Jesus kömmt, BWV151) 则是写给 1725 年圣诞的第三日。这支康塔塔讲的是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你我中间救赎者的故事。因此全曲温情脉脉，有如直面耶稣，从上帝到凡人，不再是无限遥远的距离，而是在人间中展现此世虽苦犹幸的深义。亨德尔&海顿协会的演绎不可谓不佳，但是总觉得无论伴奏还是演唱，都有许多细节上的瑕疵，比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长笛、柔音管、巴松管的声音混杂，常常模糊难辨，甚至间或显出嘈杂之感，这究竟是乐队之故，还是指挥的问题，我难以断言，比较起波士顿巴洛克的精细，亨德尔&海顿协会显得稍逊一筹。人声部分则都是中规中矩，在演唱下半场的“圣母颂歌”(Magnificat, BWV 243) 时，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以及男高音等依次出场献声，不可谓不动听，但是却难以过分褒奖，因为巴赫的康塔塔作品虽然动人，但是人声有殊，如何能与作品本身和谐交融，



对于歌唱者而言，却有别有不同的效果。

但是这一切均难掩盖巴赫康塔塔作品的光芒，人声所能表达的从低到高的完整与饱满的声场，有如上帝在我们的心灵中通通洞悉完毕之后，然后轻声道出我们内心的烦恼喜乐，让人顿显卑微渺小，但是却会感受到被接纳的欢欣。巴赫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作品的包容度如此之广阔，以致于我们总能在其中寻到内心疑惑的共鸣与指引，对于我们而言，他既是先贤，也是同道。

##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 JAPAN 日本

## 媒体何以成为战争协力者

特约撰稿人：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mailto:postdadaist@gmail.com))

在日本，近年来，由新闻媒体发起的对历史问题及战争责任问题的检讨明显多了起来。其中动静较大者，有第一大报《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编纂的《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一书（日文版于2006年7月出版，中文版于翌年推出），在中日两国的知识社会均引发了强烈的话题效应。但对新闻媒体来说，最“边缘化”的选题，其实莫过于自身历史的问题，这也是到目前为止鲜有媒体描绘关于媒体的历史的主因。而任何一个敢于自诩“公器”且负责任的媒体，要想思考并切实履行作为公共舆论平台的社会责任的话，面对过去，检讨自己在过往历史中的扮演的角色虽然相当沉重，但却是必要的功课。



《朝日新闻》推出的题为“新闻与战争”的大型系列调查报道（同名著作于今年7月由朝日新闻出版社推出），连载一年，系统而深度地考察这家大众传媒的百年老店在从“满州事变”（日本对九一八事变的称谓）到战败的历史中的角色、作用，以自我解剖、反诸求己的姿态，回答“为什么报纸没能制止战争，反而陷入战争协力的深渊”的本体性追问，在大胆回应媒体责任问题的同时，也为现代传媒社会中媒体的公信力问题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注脚。如此“出位”的历史反省、检讨，某种意义上，是最初的，很可能也是最后的尝试。对当事者的采访是不折不扣的与时间的竟跑：战时任《朝日新闻》记者的松林间，去年被采访时高龄102岁，在连载结束前夕，于103岁生日的翌日去世。

“如果哪天《朝日新闻》突然变调的话，可要小心了。”这是一名读者孩提时代耳熟能详的长辈的口头禅，它一方面诠释了彼时《朝日新闻》在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其从主张和平主义、国际协调到向支持战争的急转身对国民心灵的烙印之深。事实上，不仅《朝日新闻》，也包括当时有影响的其他自由主义媒体，如果没有大众传媒的协力，“十五年战争”（日本现代史划分，指从“满州事变”到战败十五年的历史）之“进行到底”是难以想象的。正是新闻媒体从战争批判到被迫噤声，从不情愿到情愿，从半推半就到全面协力，直到完全成为喉舌、道具的蜕变，才为军国主义化国家打造战争意识形态、实行战争动员铺平了道路。

作为拥有世界最大规模读者群的大众媒体，战前和战时的《朝日新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新闻纸，而是整合了报纸发行、新闻制片、各种以报纸为名头的商业活动，甚至航空运输等事业的立体化经营的报业托拉斯（不仅《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也大同小异）。以航空事业为例，“满州事变”时，报社拥有社用机15架，用于战地记者、新闻原稿和摄影菲林的运输；朝日航空部干部的一句大实话——“紧急情况下，可于30分钟内出动（飞机）”，令军部都为之色变。一般说来，对一家新闻媒体历史的检讨，对其社论、社评、重大事件报道及其背景的分析当是主要的作业，但如此平面化的叙事显然难以涵盖像《朝日新闻》这种“传媒大物”的历史。除了作为新闻纸的内容（报道、评论）产品之外，战争新闻纪录片的摄制及在各地的上演，对女性劳军活动的动员、组织（如“国防妇人会”、“日满妇人同志会”等），与名作家的“笔部队”合作推出前线报道及组织归国巡回演讲会；进而，后援“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募集活动，战争末期

召开旨在动员少年志愿兵参战的“少国民总决起大会”……至此，标榜“自由主义”的新闻纸“客串”了一把激进的国策协力动员者角色，并几乎反客为主，乐不思返，因为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为报社带来了报纸购读人群扩大的高附加值。

报纸成功的秘诀是独家性、垄断性。而战时，新闻人要想获得独家消息，唯一的办法是对军界“公关”。于是，以《朝日新闻》的影响力，频频组织劳军活动、壮行会，曾几何时自由主义意见领袖、报社的首脑亲赴“满洲国”拜会关东军的头面人物；凭借与军界的“良好关系”，殖民主义的铁蹄践踏到哪里，新闻社的支社、支局便开到哪里，从台湾而朝鲜，从“满洲”而南洋。在新闻媒体理应自觉保持的与国家、军部的“距离感”丧失殆尽的同时，新闻人不自觉地走上了与后者“一体化”的道路，战地记者和“笔部队”的作家们脱下西装，换上军服，像军官一样武装到牙齿；报社的社用机、飞行员被海军征用，作为回报，用海军提供的汽油，在前线与日本内地间空运写真菲林。直到此时，媒体人仍乐此不疲。很少有人想到，他们是在一条被称为“通往奴役的道路”上的被绑架者。

很快，随着败色愈浓，舆论弹压升级，军部和内务省的新闻检阅和对新闻媒体的压迫日益表面化，自觉协力如《朝日新闻》者居然也屡遭社论在付印前撤换，甚至撤换也来不及，被迫“开天窗”的异常状况。至此，新闻人开始感到战争的真实情况无从报道、公开的矛盾和压抑，但为时已晚。随着“通稿”式“官制报道”的日常化，连不同媒体间独家消息的竞争都不存在了，报纸完全成为军国的“喉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末期，《朝日新闻》的社员与社屋一并被军需产业征用，为印刷制版而开发的技术，被转用于军用飞机设计图的扩大、复制；以东京本社的摄影部长为首脑，在位于名古屋市名东区的“中部总局”所在地，设立“航空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名古屋工场”，代号为“护国第 4476 工场”。战前的反战舆论重镇沦为战时的兵器制造基地，历史的嘲弄确实够狠。与狼共舞的新闻从业者们，被剥夺的不仅是新闻专业精神，连新闻职业的饭碗都被端掉了。对此，本书作者归结为，“要笔，还是要生活，这是作为新闻媒体要有所觉悟的问题。”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日本著名作家井上 Hisashi 指出：在这种“鱼与熊掌”式的两难抉择中，“作为个体的记者不得已选择生活”，本无可厚非。但是，“记者选择笔，而报社捍卫记者的生活”，“只有理解该原则的媒体经营阵容的存在，才是一家好报纸的条件。”

不过，历史、客观地看，井上的话，其实也不无复杂问题简单化或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事实上，《朝日新闻》之所以以“满州事变”为拐点，摒弃此前的自由主义和平道路，突然在社论中变调，实现向所谓“国益拥护优先主义”的支持战争的编辑方针转型，其实恰恰是与报社首脑们的捍卫从业记者的生活、做“好报纸”的主观愿望分不开的。唯其如此，出于对军部压力下发行数量减少的不安（及对扩大发行的期待）、对孤立于大众的精英主义的恐惧及对“满蒙权益拥护论”的暧昧立场，让这家老牌自由主义大报在危急关头“华丽转身”。这与其说是报社高层对经营战略的误判，不如说是历史的吊诡。所以，战后被占领时期，先有报社的记者工会要求追究报社高层的战争责任，从而掀起被称为“社内革命”的社内民主化运动，后有报社首脑遭美军当局（GHQ）整肃，黯然下台的一幕。而被整肃的个别人士口中的“《朝日新闻》曾经是自由主义媒体”云云的辩白，在历史的浓重大幕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可怜、可笑。

回过头来看，截至“满州事变”前夕，《朝日新闻》作为“自由主义”报纸，尽管主张以裁军、普选权、国际协调为代表的“和平主义”路线，但在当时被看成日本最大“国益”所在的满洲权益问题上，则始终持暧昧的肯定立场，基本不脱“对内宪政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套路，与力倡满蒙权益放弃论的石桥湛山和坚持批判军部立场的横田喜三郎等铁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已然拉开了距离。正由于这种学理立场上的内在矛盾，一旦政府、军部方面有何风吹草动，报纸经营受到某种压力，轻易便放弃原来立场，改弦更张，其实未尝不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即使在转向后，按绪方竹虎等报社首脑原来的意图，仍然幻想一面与军部构筑和谐，一面以此为依托，试图保留些许批判、抵抗的萌芽，伺机东山再起。但如此首鼠两端的人文小算盘，显然跟与狼共舞的主旋律太不合拍，且对诸如介入的深度、罢手的时机、何时反守为攻等问题，既无战略性通盘考量，也缺乏对抗的勇气。共舞的结果，只有被“狼”牵着，一步一步走向“通往奴役的道路”是不言自明的。

战后，出于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更由于冷战和基于冷战需要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型，与德国战前、战时的报纸遭悉数废刊的命运不同的是，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的日本主要报纸，经过短暂的整肃，均得以保留。《朝日新闻》也在反省其“战争协力”的不光彩历史的基础上，实现了“重新出发”，并以彻底反省、批判侵略历史，坚决捍卫民主主义普世价值的主调，再度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左翼舆论重镇。此番烛照历史暗部，挥刀自宫式的反省，纵然其深度和成果有待检



讨，但其反诸求己的决绝姿态本身，尤其是从逝川中抢救正面临湮灭的战争历史资料的艰苦作业，无论如何值得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大众传媒的百年老店，从战前到战后不止一次遭保守派军人和右翼分子血洗的报纸，不但担得起读者的敬意，而且值得人们阅读并继续阅读下去。

《新闻与战争》：(日)《朝日新闻》“新闻与战争”采访班 著，(日)朝日新闻出版社 2008 年 7 月版

## HONGKON 香港

### 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

特约撰稿人：严飞(美国·旧金山, fei.yan@green.oxon.org)

刚刚过世不久的俄罗斯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在 1982 年访问台湾时曾感慨说到：中国人是幸运的——大陆之外，还有香港和台湾，而俄罗斯却已经全境赤化了。在此，索氏对香港的赞誉不言自明，与大陆仅仅一河之隔的香港，其独立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乃至自由意志，都是对于当时刚刚拉开改革开放大门的中国大陆一个极大的补充和对照，同时也作为一个缓冲点，巧妙地将中国内地和世界舞台衔接在一起。

索氏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一国两制”的构想刚刚出台，中英联合声明尚在酝酿，两国之间的种种政治角力也并未有过分激化，然而对于香港前途、身份认同的思考却已经开始萦绕在每一位香港人的心间。索氏赞誉之下，香港人却选择了一条更加趋于现实主义的道路，九七回归前夕爆发的大规模移民潮就是这条现实主义道路的最好注脚：从 1984 年至 1997 年间，有超过 10% 的香港人移民海外，而留守下来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出于经济原因无法成行，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回归十一年多下来，香港虽然经历了包括金融风暴、禽流感、非典疾疫、管制风波、边缘化危机在类的种种挑战，但就整体而言，香港依旧保持了自己“东方明珠”美誉下的经济活力，香港人也在“一国两制”政治框架的践行之下，逐步打破了香港人、香港社会与内地之间的心理隔阂与界限。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当初移民海外的香港人，最近两三年选择回潮香港的越来越多。根据一份加拿大报纸的报道，至 2007 年，九七之前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的 20 万港人中，有 1/3 就是因为受到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吸引，又选择回到了香港。

之所以在此花费如此多的笔墨交代背景，是因为我们固然看到香港回归这十一年来的这许多欣喜变化，但香港的发展从来就不会是一帆风顺，回归前后有风浪波折，未来的道路同样也会有波折风浪。

未来的波折风浪何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其实就是展望香港下一个十年可否迈入光荣年代的关键，否则，又如何期许香港的发展可以乘风破浪？

为此，陈冠中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香港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不确定的年代，“不确定一词指的就是一些在过去确信不疑的观念，面对当前问题的时候，出现把握不准的状况，让人犹豫难决。”回归十多年下来，香港特区的体制、管治指导思想和内部问题，很大部分依旧带着八十年代的烙印；八十年代所制定出的重要决策和定下的发展基调，对今日香港有着正面与负面的重大影响。所以事实上，香港过去的十年更多是对于回归前的延续。

在陈冠中的香港论述中，八十年代一直被其视为形塑今日香港价值观、自我认知和社会形态的黄金年代，不仅为香港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同时为这一代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认同构建出丰富的文化土壤（参考陈冠中的另一部著作：《我这一代香港人》）。所以在陈冠中看来，邓小平那句名言“五十年不变”中的不变，其实指的是八十年代的香港模式不改变。

然而陈冠中认为，下一个十年，香港的发展方向不止是不确定，并且似乎要有和过去模式相断裂的危险，而其根源就来自于“五十年不变”之下的种种改变，或者更具体点说，香港模式的改变。

所谓五十年不变，但是五十年之后又该怎么变？邓公的原话，“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其言下之意是指，香港的命运必然是和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十年之后，变得不是香港，而是内地。等到法制的传统、民主的理念、



自由的精神在大陆全面普及，香港还需要变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预测，香港的明天取决于两种速度的比较，一种是香港大陆化，一种是大陆香港化，哪种发展的速度快，将决定未来香港的发展。可能内地并不屑于将香港作为自己赶超的标杆，而是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即雄心壮志之下所谓的“美国化”。同时另一方面，也很难预测“五十年不变”以后的大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迄今还尚未完全看到一种主动性的倾向——中国是否会走向一个稳定的、有序的、民主和法治的情境。所以所谓的“大陆香港化”，与想象中的“香港化”，还会有落差。

但对于香港而言，其大陆化的趋势却在回归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愈发明显，并逐渐成为香港最大的改变。香港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一座城市”，从而导致不少香港人的恐惧感在相应增加，看看前不久曾钰成当选香港立法会主席之后的坊间评论与质疑，就可以略知端倪。更为忧心的是，这种改变的程度是如此缓慢而少有人察觉，而其未知的影响却让我们不得不担心香港本土一些东西正在逐步丧失。

例如我曾经专门就此问题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有过一次长谈，他向我讲述了他一次参加香港新城市规划咨询的经历。作为以香港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吕大乐更加关注香港本土文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平衡与互动。但遗憾的是，香港的政府官员却过于强调城市新建筑的经济利益，并以自己考察上海浦东的体会为基础，号召香港要学习上海的建设速度，复制上海的革新气魄。吕大乐听了就很生气，他说，拜托！这里是香港，而不是上海，尽管上海有它值得学习的地方，但香港不能盲目照搬照抄。香港需要的不是速度和气魄，而是一种与香港本土特色混合在一起的城市文化精神。

在书中，陈冠中将下一个十年作为观察香港未来发展走势的黄金时期，这里面固然有着中国人喜欢纪念整数时间的传统，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们再去考察香港的时间点，应该是回归后的25年最为恰当了（即14年后的2023年）。为什么是25年呢？因为这是“回归五十年不变”政策的一个中点，同时也是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经过4至5年的操作后的一个检验点，正好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和检讨，符合香港模式的经济形态（特别是与珠三角的协同合作关系上）和政治制度（双普选的实施成效上）到底发展（或者说改变）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到底是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二者怎样结合在一起？香港是否可以迎来自己的光荣年代？对于这些疑问，可以用陈冠中的原话来回答：“香港一国两制的实验尚未有完成，港人任重道远。”

《下一个十年：香港的光荣年代？》 陈冠中著，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年7月版，153页，港币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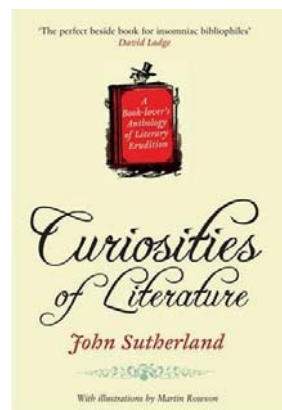
## ENGLAND 英格兰

### “奇趣”文学手册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文学何来“奇趣”？看罢题目，读者难免有此一问。传统观念中，用来“立言”文学历来被视为大业和盛事，仿佛非正襟危坐不能谈论之。而咱们谈论文学，动辄便是“鲁郭茅，巴老曹”，一碗水端平，何“奇”之有？身为资深书评人兼文学教师的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却在《文坛异闻录》（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一书中提醒读者：别忘了，文学还有源自生活之中，出乎文本之外的一面。批评家的任务除了对文本的“诠释与过度诠释”之外，也不要忽视了“诗外功夫”。

显然，萨瑟兰自己的“功夫”，大都用在了“诗外”。在他的旧作《如何阅读一本小说》（How to Read a Novel）中，身为前布克奖评委的萨瑟兰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让现在的读者阅读一本小说比让他们自己写一本还难？他自答说，大量的改编影视作品使得年轻一代不愿直接阅读原著，更不用说去了解文学背后的故事了。而萨瑟兰的作品，恰恰试图告诉读者文学背后那些有趣的人和事。记得年初读萨瑟兰在《卫报》的专栏，发现除了他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一些“非本报立场”的意见之外，通篇皆是掌故，当下即惊为天人，心想这位老先生如着力出一本“书话”或文坛掌故类的集子，当蔚为可观。果然，作者在年底之前推出本书，为英国读者解颐。



不过，若仅将此书视为出版商针对圣诞节市场而推出的快餐读物，未免太过轻巧。萨瑟兰在序言里便表明自己写作的动机是受到了文学家艾萨克·迪斯雷利（英国 19 世纪著名的文人宰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之父）《文苑搜奇》一书的启发。说到此书，想来中国读者并不陌生，钱钟书在《管锥编》和《旧文四篇》的脚注中多有引用（旧译：“狄士瑞立”），足见其“干货”之多，内容芜杂丰富之甚。萨瑟兰也自承他创作此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完成迪氏的“未竟之功”，因为尽管《文苑搜奇》在 1791 到 1823 年间多次再版，成为文学青年一时之选，但怎奈其年代久远，篇目错舛时出，加之出版尚早，未足令读者耳 20 世纪新文学之语。萨瑟兰觉得，作为书评家的自己有必要及时出手，为迪斯雷利作一段 20 世纪的“番外篇”。

事实上，爱书之人的确能在字里行间发现众多 20 世纪不为世人所知的欧美“文坛轶事”，它们可能是逗乐的、随意的、琐碎的，甚至带几分戏谑和嘲讽。在本书中，你能读到诸如：E.M.福斯特是首位将快餐（fast-food）写进小说的作家吗、哪位美国总统使得伊恩·弗莱明一夜成名、作家们都用什么牌的打字机、哮喘与文学天赋有什么关系、克隆狄更斯在科学上可行吗等等有趣的问题，而作者在书中都会一一作答。同时，萨瑟兰也不忘为一些历史旧账“翻案”，例如针对桑塔格等人认为《失乐园》的真正作者是弥尔顿的三个女儿，萨瑟兰一口咬定说那只是“6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一厢情愿”，至于他的证据是什么，恕笔者不能透露太多，否则阅读过程的“奇趣”会因此损减。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有言：文学之用于“给平常的事物赋予一种奇趣的氛围”。在这个连文学也被数字化的时代，还有多少东西是能让我们感到“奇趣”的呢？在索尼每年都推出新的电子阅读器，人们的阅读习惯不可避免地朝着《美丽新世界》的预言而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萨瑟兰似乎更喜欢“回头看”——在过去的这个世纪，纷杂的文学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尽管作者在动笔写作前曾发了类似“继承迪斯雷利遗志”这样的“宏愿”，但萨瑟兰此书的叙事也许并不那么“宏大”，自铸“希腊小庙”的成分更多一点。《卫报》有一篇书评将《文坛异闻录》比作“包含所有书”的“沙之书”，这样的称颂是否恰当，至少博尔赫斯先生会持保留意见，而至于此书是否完成了迪斯雷利的“未竟之功”，还是留待那些“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读者作判断吧。

**John Sutherland: 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兰登书屋, 2008 年 10 月, 12.99 英镑**

## 书评·文学

### 与书店有关的日子

观察员 戴新伟（广州，yukon1944@yahoo.com.cn）

读《书店的灯光》，可佐以最新修订版的《书店风景》。前者是一位美国书店从业者十七年从业经历的杂笔，后者则是以逛书店为名写下的各种书店特写，修订版还包括后续报道以及书店网址、活动 DV 片段等内容。11 月号《万象》杂志有钟芳玲一篇《重访鲍德温书仓》，正是对此书的长篇补白。她与刘易斯·布兹比两人对书店的痴迷殊途同归，并且都常住美国旧金山，记叙的书店、轶事有大量的交集，就两本书来说，仿佛是店员与读者的对话，对象就是他们一生工作与闲逛的地方，也是一生中挚爱的地方。

刘易斯·布兹比回忆他童年受到的眷顾——作为萧条年代的过来人，他父母鼓励他多阅读、多受教育；十五岁那年在陪他母亲做头发的间隙，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让他知道了何谓“当书店开门迎客，世界的其他部分也随之而来”，一如他十二岁时震撼于“甲壳虫”。从此那位热衷游荡在书店里的男生有了目标，文字的力量让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一些不是高中教师的成年人，他们懂得莎士比亚、书和写作的重要性”。也因此，大一学生刘易斯“毫不犹豫地中断了在 7-11 卖冷饮的远大前程”，转而到这家名为“狂鸦”、对他的一生有着重大启示意义的书店打工：满足嗜好，结识朋友，学习书店业的专业知识，从书店职员做到销售代表（刘易斯将其比作古时候东方的“书贩”、西方的“书佬”），当然他也成为了曾经如饥似渴翻阅的书籍的撰写者——除了这本分类为“图书史”的《书店的灯光》，刘易斯还写有两部小说，并在旧金山大学教授写作课程。



这位“刘叔”(P145)的才情确实让人感到,阅读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人。他的“专业知识”尽管远远多于中国普通读者对书店行业运作的了解,但并非罗列帐簿:在做销售代表与禁书等(第五、八章),插入了一些书籍的历史,却也没有掉书袋之嫌;他关于书店从业经历的部分(第一、三、四、七等章)都深谙写文章的远近取舍之道。假如少一些“资料性”,多几条情节(他的书店同事,也是良师益友的格蕾塔·瑞,即是活生生的小说人物),拿掉第九章的一系列随笔,这就是一部小说。爱书的读者能轻易捕获这位刘叔笔下的书店氛围,而这未尝不是一种小说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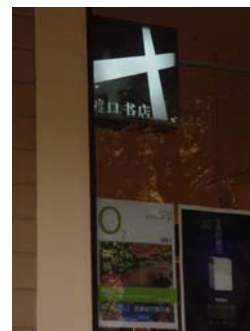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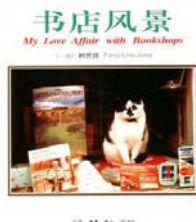
当还是大学生的刘易斯被“狂鸦”书店录用后,他说:

“我想我是找到了一份我只能形容为‘酷’的工作,然而感觉要更深切和复杂,就像是找到了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P19)

这种他称之为“酷”的感觉,并不是大多数中国“书城”、“中心”之类的地方传达出来的,更不要说一步步学来的书业知识:比如刘易斯长达两年,在“狂鸦”填了三次工作申请表,比如从图书上架、分类到成本核算一系列的行业只是(工作就是工作,而非仅仅满足个人趣味),又比如他真正到“狂鸦”工作后,书店的老板们隔段时间就会“给新雇员讲授图书、出版和书店的历史。他们希望教会我们不要局限于结清账目,打扫卫生和了解哪些图书上了畅销书榜,还要有所突破”(P55)。这种“酷”甚至也不是美国超级连锁书店的店员体现出来的,虽说无论是刘易斯还是钟芳玲都侧重叙述独立书店,但反过来看,不正是现代商业的成功模式,抹杀了值得记上一笔的独特性么?作为一家独立书店的老板(即使员工,差不多就是《书店风景》里的书店掌柜们),远远比连锁书店的员工(甚至老板)更为特别。

整整十年前,阿汤哥所代表的大型连锁书店与独立书店代表梅格·芮恩上演了一出好戏(《电子情书》),十年来在书业发生的巨大变迁不知是否惊醒过两位的鸳鸯——现实恐怕还要残酷得多。时代变化,购买方式变了,即使大型书店,也必须求新求快地建立网站,必须抓住网络销售这杯羹。刘易斯作为图书业一环上的一分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当不过是在逐渐与其他文化产业一样,沦为某家庞大传媒帝国的一个部门而已。但他和钟芳玲共同写到的独立书店依旧方死方生,并未完全绝迹于市场利润的压力之下。《书店风景》给读者留下了许多印象独特的书店形象,有的即使转手关张,总有人接手或新张。刘易斯跳槽到他心目中的“世界级书店普林特斯”之后,他发现这家位于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郊区书店成了“支柱商店”,带动了附近更多商铺的兴旺,使得周围居民融入其中,逛书店买书成为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而绝非简单的拉动内需:“围绕普林特斯滋生出的乡村生活是建立在书籍以及书籍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上,而非将书店作为又一购物场所。即使只有短短三个街区,这个城市的中心就是书店。”(P82)钟芳玲将此类独立书店的意义归结为唤醒社区意识,而每当独立书店有难,亦会有本地有识之士加入抢救行列。两本书都写到了旧金山著名的地标书店——诗人佛林格堤的“城市之光”书店,该书店与店主均获得了该地区文化上的坐标地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更通过售书以及由书店举行的文化活动(如朗诵会、诗歌节)使其影响力辐射全世界。《书店的灯光》和《书店风景》不约而同都写到了在2001年10月28日,为了抗议布什政府借“反恐战争”出台的《爱国者法案》,“城市之光”书店打出了五幅巨型白布条,写着“异议并非反美”标语(《书店风景》就有这张现场照片),再次证明了一家独立书店的作用”。

《书店的灯光》曾于2007年12月由台湾网路与书翻译出版,书名抒情但还靠谱,《如果你爱上一家书店》(除了书名,译本相同,大陆版有少量删节)。这么快出大陆版,策划人功不可没。据说因台版封面(也是原版封面)图片太过昂贵未用(德国画家昆汀·布赫兹的作品),现在的封面出处在钟芳玲的《书店风景》里——正是著名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露天书摊(可参见该书P21、P29)。我相信惠特曼画像下的书名,书名下密密麻麻的书,都能吸引读者,尤其是患了书痴症的读者。然而读《书店的灯光》却远较一本书痴之书更令人感慨:除了刘易斯毫不自矜的笔调,资深的从业经历这些优点,他的故事对书店经营者、读书人、爱书人都不无裨益,那些寄托了我们私人爱好和趣味的地方,是如何体现着一种公共性,它的从业者又是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诚然,不是每个书店老板都能如“城市之光”的佛林格堤那般勇猛精进,不断讽刺社会,但刘易斯(包



括钟芳玲)对美国独立书店的叙述表达了从业者的喜好,也表达了他们的情怀;证明了这些书店的生命力,更证明了他们对周遭世界产生的影响力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能让读过这两本书的从业者有个参照,亦能让读者重新审视——究竟自己常去的书店对自己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 书评·文学

### 邮差敲响时光之门

特约撰稿人 张无极(北京, zhangwujibook@126.com)

就在两天前,我购书热情高涨,且发现新大陆似的登录了中国图书网,找到自己心仪已久的图书,而且是很低的折扣,这个互联网里也有小巷道。我购买了《扎根》《老师的提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阿兰罗伯格里叶》,《恰似水之于巧克力》,《死孩子之歌》,《狄更斯演讲录》等等,以及我要在这篇短文里提及的《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

在购买的一摞书中,有一本薄薄的册页不满100页的书,封面有一副肖像,占篇幅近一半,书名为《皮箱》。这是一本诗集,作者是朱朱,作为被圈内人士揶揄为硕果仅存的诗人,我记得在2000年的夏天,在南京东郊的国际青年旅馆举办的一次笔会上见过他,他留有一头长发,有着小城镇青年的目光和散漫的服饰,鼻颊顶端一颗鲜明的痣粒,使他看起来更显削瘦。

他的语气淡漫,抽着烟,无论坐还是行走,仿佛罩着孝陵卫东郊小集镇的一团雾气,这是一个古怪的印象。我们还不经意的交谈了两句?那天好像还有现场朗诵,我已经记不起来。所幸的是那个会上我结识了一个优秀的女诗人沈木槿。此后若干年,我们竟在北京的一家小酒馆相逢了。哦,生活。

瞧时光那边,那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夏末黄昏。我们在草地上漫步,谈诗论艺,那个从世俗现实里剥离出来的诗意场景现在想来显得极不真实。这仿佛是来自一个虚构的场景。这种感受同样荡漾在我阅读一本出版于3年前的旧书带来的微妙和晕眩中。这本书的名字叫《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



这本书的出版恰逢2005年,正是中法文化年,这个时期的一本特殊书籍不仅有赖于这个特别的年份、傅雷资助出版计划以及法国外交部,更有赖于这本书所描述的,或者说试图复活的一个外交官。正由于他是一个外交官,获得法国外交部的资助或许是理所当然的。这么说的根缘没有其他,就是说,这个叫儒勒·乐和甘的人值得他们出这么一笔钱。

50多封被束之高阁的信件、数十张照片、1921年生于重庆领事馆的小马利(儒勒·乐和甘之女),一个曾经恰好就在满头银发的“小马利”家居住过的译者,等等,我相信这本书的诞生未必始于偶然。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邮差必然会敲开时光这边的门扇。当然这是题外话。

我要说的是另外的元素:

这本书的动人之处,在于以一个非常平实且不做修饰性的家书来展现那个时代的人与事,地点是挪移的,由着这个年仅24岁的法国青年从成都出门穿越中国的街道,手拿名片登门造访那些头戴花翎的道台开始,一直到使他的生命笼上迷雾的北国哈尔滨结束。且看他的历程:先是成都,重庆,继而是汉口、海口,汕头、广州、香港、再天津、北京、上海和哈尔滨,这算是一个坎坷曲折的路线。这个路线上有被政治动荡气候下毙于路旁的无辜民众,有古道上风尘踏起私人大轿,有川渝河流上的鹭鸶和渔翁,有出殡的人群和难民,有街头玩耍的孩童,有令人为之惊悚的三寸金莲,街头乞丐,泊岸的战船,阳光下疾走的军队,有巍峨气派的宫殿,胡同里的拉锯的居民,长城脚下的驼队等等,较之那些真实而苦闷的,如那些暴毙横尸场景,领事馆内的藤蔓,香槟酒,喧哗还有那些不定期的聚会,等等,足可以看出另外一种闲适逸致,他们几乎独立于那个时空的。

相对于那些时日的动荡,他们也是有过恐慌的,那个时候恐慌的人才是真实的。但他们几乎还是有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气象,当然,这些在中国大地上走过的异族,又定然有着缤纷迷人的故事,尤其是在时隔多年的今天看来。

这个24岁来到中国的年轻人,从一个地点奔向另一个地点,直到最后的终点,时间是1945年,地点是让他的妻子曾



经产生过“我们到底是在欧洲，还是在满洲”恍惚感的哈尔滨。一个个地点的挪移，基本以时间为线索，在这个纵深里，这个年轻人的面孔也由意气风发到仓皇疲惫。他的面孔上几乎映过中国历史上所有惨烈的演变，从旧中国、帝制、共和、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等等，见证了中国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他是一个独特的见证者，也是一个奇怪的看客。

或许用奇怪一词并不准确，之所以说他奇怪，是因为他几乎是一幅冷眼看世界的目光（当然，他也有过热忱，譬如为1910年塞纳河大水募捐，譬如为1918年的法国担忧）。这个时刻进行的历史，世界格局的大动荡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为之研究和奋斗的激情，他使我想起了卡夫卡，在卡夫卡的日记等文字里找不到世界大战的片言只字。在这本真挚而不乏恋母情结的家书里，虽有叙述，却是一种超然独乎其外的语气和心理。

这使我想道，通过这些书信和图片，我们或许能复活这个男人的一生，复原这段理应梳理和打量的历史，或许丝毫不能有还原的可能，有的只是这个故事在时光深邃感里带来的迷醉效果。

1945年2月13日，毫无疑问是一个灰暗的日子，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领事在他的辖地孤零零的死去，死之前，他有5年之久没有见过自己的亲人，妻子和一双儿女（有一个死于疾病）。这个五年里在哈尔滨这个颠沛流离的骨肉分离的极地，他该如何度过？书中有一张他最后的照片，坐在1944年7月14日的酒馆（还是领事馆内）那张侧身椅子上，他偏过头来，目光阴冷，脸色中有一丝掩饰不住的悲戚。

这是一本独特的书，临接近结尾，却使这个人的生命历程陡然一转，1955年的一天，一个从西伯利亚囚房出来的叫沙莱夫的神父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告知世界一个令人惊诧的真相：儒勒死于谋杀，凶手是日本军情特务。然而奇怪的是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而是成为一纸寂寞的档案。

有档案就有了探究，从此开始让你重新萌发了对这个人的阅读兴趣，他的这些信件上不加掩饰，随心质朴的文字背后是否掩藏着他的另一个人生？他不仅仅是一个领事？

这本书带来的另一重惊喜和乐趣就是使一个喜好阅读和缅想的人可以自由驰骋自己的想象，去罗织一个类似007的侦探悬疑故事，当然主人公还是儒勒·乐和甘，背景也必然是混乱年代的那年中国。如果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些几乎象是一个意外之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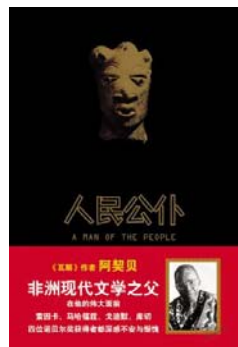
博里斯·马尔坦：《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张宇凌 译，岳麓书社，2005年5月版，定价：22.9元

## 书评·文学

### 眼下，正是看公仆干好事的时候

观察员 朱白（广州，[zhubai@tom.com](mailto:zhubai@tom.com)）

“公仆”原本是一个善良的词，可在今天，他可以是“上面派来的人”的一种护身符。在钦努阿·阿契贝这部被誉为“当代最佳英语小说之一”的《人民公仆》中，小人物“萨马鲁”玩笑般地对待自己的生活，眼看着自命公仆的人干下各种勾当，他不自觉地一点一点地成了非洲大地巨变中的一个缩写，各种看似荒唐的玩笑一一降临在这么一个本来弱小、平庸的小人物身上，巨大的荒谬感，似乎可以让读者一不小心就忘却所有细节，进而体会到遥远的非洲发生的那一场场裂变和深入民族血液的文化。



阿契贝似乎擅长用幽默的语言讲故事，他可以将一个悲哀的人生用让人发笑的方式描写出来，不管这里面蕴藏多么巨大和丰富的悲哀，作为一个读者你都可以快乐、流畅，甚至有时候还会带着惊喜地读到。小学老师“萨马鲁”带着强烈自尊心从乡下来到城里，在离美好人生就还有那么一点点距离的时候，他遭受到了最大的侮辱，带着伤痛回到家里，父亲、家人、同盟（一个不以丈夫的背叛为背叛的老婆）、情人（情敌的未来老婆，加上之前的迷恋过，他更是将这个女人看成反击的最好目标），以及跟他打交道所有人，都站在了他的对面，除了排斥，就是冷嘲热讽，当然，还有无能为力。他只有选择革命。“萨马鲁”展开反攻的方式充满喜剧人物的悲哀。这个人物的悲

哀称得上是一以贯之的，早在“萨马鲁”遭受羞辱之前，在城里他的女人爬上部长大人的床上时，“当我们之前从医院回来，南加部长就要他的仆人把爱尔丝的提包拿到他回乡探亲的妻子的房间里去了，因此我提高的警惕。不过，我很快就安慰自己，他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他的得体和周到罢了，我心底涌起一阵感激之情……”越感激，越悲哀。尽管他称这个他来城里就是想搞一下的女人为“轻浮的女人”，这种状况下（被自己的老师和长辈先下手为强），还是会感受一种深刻的侮辱。他被权力欺凌了。在接下来的革命中，“萨马鲁”依然是弱小的、可笑的。这让人想起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滑稽的自言自语，主人公都在这样一个巨大荒诞的世界里苦心缔造一个同样荒诞的人生。

在自己的革命同志被掌握权力的一方暗杀之后，“萨马鲁”仿佛洞察出真相清醒地叙述道：“柯克部长的一辆吉普车便从后面冲上来，将他撞倒，当场将他压死。警察（脱下制服就变成党的暴徒）漫不经心地逮捕了吉普车司机……”可是你从这语气也应该看出一点轻松和随意，这当然是环境给人的磨练，同时也有其人生荒诞的原因。

钦努阿·阿契贝喜欢用非洲的格言和俗语，常常信手捏来一条，本来已经很活跃的故事立刻又会再添几分声色，他经常会在不长的一段话里连续使用这样的比喻，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确是在用精确的方式恰当地叙事。“当一位老太太只能用耳朵听别人跳舞时，她才知道年龄已经把她隔绝在荒漠里。”似乎不需要钻牛角尖地去理解这样的句子，它放在那里，也许在你路过时自然会瞧出它代表的意义。但有些时候，对以一个异族人来说，偶然读到这样的俗语，也许会构成障碍，会去猜想作者的真实用意，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最巧妙的嘲讽往往让你看不出，甚至会往相反的方向理解。在阿契贝大概最为中国人熟悉的短篇小说《宾叔叔的抉择》中，作家离奇地在短短一小段中放入了无数个这样的俗语：“我可真是刚出炉的面包，炙手可热。……我父亲教训我说，真正的本乡子弟必须得能够睁着一只眼睛睡觉。……乌木鲁的女人都很精明；你还没数一，她们就数得出二。……那年头我见过好多年轻人为了女人丧了命，因此我牢记父亲的教诲：永远不要让跟你握手的人摸过了肘子。”对于这样泛滥地使用格言，或者你一晃而过，让自然的语感告诉你应该领会的要义；如果你是一个较真的人，有时候还真要多一些停留，仔细揣摩一下这些绝妙的比喻。



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尤其又是《人民公仆》这样流畅的故事，所谓的阅读障碍应该压根就是一件不存在的事，只要你读下来他的小说，陌生的俗语不会影响你的理解，他们像树上鸣叫的昆虫，即便你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也会为之感到自然界中生命的痕迹。

如果说，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是流亡作家的话，那么阿契贝则是一个被“流亡”的国家的作家，他比这些前人更为“艰辛”的是，他要以自己的视角和理解力诚实地写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被“流亡”的全过程。这个过程要抵达每一个读者的内心深处，其技术难度和心灵折磨要比所谓的史诗困难得多。或者，如果我们放弃对“史诗”这个被滥用得日趋庸俗的词的刻意偏见的话，那么阿契贝所书写的正是一个民族刻骨铭心的史诗。他的诚实里有一种不安和窘迫，他用个人的力量和才华，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整体悲哀，坦率并幽默地讲出那些最朴实的事实和判断，而不是我们这个国家中一些作家干的事——虚妄得真的以为自己在改写历史、在撰写传奇，并且将个人单调的体验简化成无知的结论。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被冠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李锐的《银城故事》，作者谈到其小说中的一个道具牛时，说这头牛会成为文学史中的一个人物肖像（大意如此）。臆想自己笔下的人物放入历史中，这是非常高尚但不高级的念头，我们虚妄的地方在于，这种事总是一厢情愿。对阿契贝来说，他不需要提醒他的读者，哪一个人物应该是属于文学史的，哪一些细节会让大家会心一笑，哪里格言、俗语能让人拍案叫绝，这些都不是作者自己应该做的事。可笑的地方还在于，我们的作家常常将自己这些惊天动地鬼神的虚妄之语印在自己的书上、刻在自己的名下，放佛宣告自己有多傻一样。

阿契贝在当下的中国，有着无法言说的现实意义，即便不提技术等话题，他对民族、现代化等的宏大叙事和对苦难的理解，都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关照现实的一种角度。当一个人囿于眼界和现实而无法看到时间上的更远处时，他可以借助前人的遭遇来读懂自己的生活。文学的意义，大概也应该包括这一点吧。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坐享其成地来好好看看这一部《人民公仆》。

据说阿契贝因为这部过于准确的“预言小说”而在后来流亡海外，小说中的政变，在现实中竟然实现了，所以阿契贝要背上预先知道内部消息的罪名。这样的判断非常不可靠，作为小说家来说，他的工作只是用自己的见识来描绘他所能理解的事物，无论准确与否，或者伤害到谁的利益，都是“题外话”，他不是出来搞预言的，更不是被人当枪使的。除了“文学”这两个字以外，任何对小说家的要求都可以看成是非礼的。

《人民公仆》，钦努阿·阿契贝著，尧雨译，重庆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版

## 书评·政治社会

### 寻找民主化的条件

特约撰稿人 羽良（北京，[priestliu@gmail.com](mailto:priestliu@gmail.com)）

长期以来，国内知识界对于转型政治中的民主化问题存在严重的误解和判断。在上个世纪八十年末一系列公开的民主运动偃旗息鼓后，大陆知识界出现了所谓“从思想到学术”的转向。这一转向的根本背景，便是国内民主运动受到巨大挫折后的反思和理论再探索。这一过程中所贯穿的深深的现实关注和问题意识，无疑是值得赞赏的。知识界的这一转向最终却出现了所谓的“左右论战”和所谓的第二次、第三次“改革大讨论”。在思想上，出现了反民主的政治哲学误读，典型如列奥·施特劳斯等人的新保守主义引介，以及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兴起；在理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主渐进论和民主充要条件论，前者以“渐进市场化”、“后发优势”、“增量民主”、“法制主义”等理论为代表，后者则是“市民社会论”、“宪政论”为典型。

事实上，碍于整个九十年代理论和实践资源的匮乏，知识界的所谓“从思想到学术”的转向并没有真的解决中国未来民主化问题所亟需的理论资源匮乏的问题。相反的，更多的知识精英迷失在西方庞杂繁冗的理论概念中不能自拔。既不能够深入他人的历史、知识和学术传统，也不能够利用本土丰富的田野资源，为西方学术界的中国问题研究提供像样的问题和原始观察。纵观九十年代以后的大陆知识界，真正为海内外理论界所关注重视的成果，要么是海外华人学者的实证之作，要么是一些非学术化但不乏经验洞见的泛历史著作。而那些曾经为学界所信奉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药方，几乎都禁不起长期的检验和推敲。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本来基于中国民主化问题而反思出的理论解释，不仅没有成为民主化的“工具箱”，反而越来越热衷于对现行体制做“合理化”和“最优化”的解释。知识界的理论没有成为民主化的资源，反而成为权威巩固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一趋向倒是真真切切反映出国内最近 20 年整体的保守化趋势。



与主动向威权靠拢的知识界保守派不同，知识界仍不乏刘军宁、贺卫方、秦晖、徐友渔等坚持政治自由主义的学者不断引进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试图为中国三十年改革史提出有别于官方史观的解释，为民主化转型充当理论资源。但无论是风靡一时的“市民社会”，还是方兴未艾的“宪政民主”，在解释中国问题时，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些概念的共同特征是其意义往往基于成熟的西方社会背景，在应用于既非民主化，亦未完成资本主义化的中国社会时，几乎难以找到适用的概念主体。

理论上的困顿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来临。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威权强人邓小平的逝世，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中国，其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永远不会因理论的乏力而停滞。2003 年以来城市维权运动的兴起和新社会组织的勃兴，似乎极大触动了理论界中敏锐者的神经。以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1998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人类学社会学译丛中，以社会运动为题出版了一本十年前美国社会运动理论前沿学者的会议论文集，几乎是国内 1989 年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专门讨论社运问题的理论专著。此后，2005 年至今，三年中先后翻译出版了 Sidney Tarrow、Charles Tilly 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与历史社会学巨擘的著作。这其中，最新引介的一本，便是不久前因淋巴瘤去世的美国历史社会学家 Charles Tilly 晚年名著《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格致出版社，2008 年 7 月第一版。下简称《抗争》。)

行文至此，可能有朋友觉得笔者废话太多，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才引出正题。也许吧，但笔者总认为，交代清楚上述国内知识界的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阅读 Tilly 的著作。尤其是对那些同笔者一样不谙欧洲历史的读者来说，《抗争》一书的重点并不是同以往的历史著作那样描述欧洲过去 350 多年动荡的社会历史，而是在纷繁的历史资料甚至琐事沉渣中，找寻出欧洲国家从传统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促成国家民主化或去民主化的条件。这种结构化的历史分析方法，倒是颇有几分当年黄仁宇提倡的“大历史”的味道。对于现实感充沛，不乏问题意识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

来说, Tilly 著作所带来的方法和分析框架, 应该远远比他分析的资料对象来的亲切。

在《抗争》一书中, Tilly 始终强调“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条件”未必是有意识的创造出的, 更多的是国家演变过程中, 由于国家在资本、承诺和强制方面不同的能力体现所构成的组合变化形成的一系列偶然后果。若以今天中国的情境论, 民主的实现当然不能期待每个人都成为民主理论家。“宪政”、“公民”、“自由主义”等等这些广为知识分子鼓吹布道的概念, 在很大程度上, 恐怕并不具有直接推动历史进步, 或直接说, 推进民主化的功效。毕竟, 没有哪个国家只依赖思想启蒙有意识的成就民主化。但长期来看, 这些概念和理论资源背后所指向的, 却正是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巨大的社会认同危机。这样的认同危机, 加上商业社会所带来的权利意识的自觉, 混合成今天中国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从厦门市民散步, 到今年 314 拉萨事件, 瓮安事件, 再到杨佳案二审时法院外支持杨佳的群众示威和重庆、广州等地出租车司机“喝茶”, 以往以固定利益群体形成的嵌入性认同, 正逐渐开始通过“公民权利”、“宪法权利”等概念普及, 形成新的、跨群体联盟性质的超然性认同。理论成为行动的工具箱, 意识形态与民主化的关系, 正通过抗争政治的实践重新形塑。

但是, Tilly 在《抗争》一书中不无警示的反复提醒, 仅有如上这种催生民主化的条件, 并不足以保证国家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前进, 更不能保证, 某一时期促进民主化的条件不会在另一阶段转变为去民主化的因素。就像今年 314 的拉萨事件, 正是由于民族问题上沉疴已久的类属不平等深深嵌入了中国的公共政治之中, 而可能解决这一类属不平等的信任网络却早已因中国政治固有的封闭保守而自绝于公共政治领域之外, 最终导致了集体暴力政治的出现。由此带来的一连串事件和后果, 如西藏流亡人士对温和路线的动摇和达赖本人身体日衰, 至少在目前来看, 很难判断出这些事件和后果, 日后会否促成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条件。

在 Tilly 看来, 对政治民主化的判断和预测, 必须基于对国家性质和能力的准确认识。但讽刺的是, 最近二十年以来, 国内知识界一方面拒绝再用“党国”之类简单但不失清晰的框架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能力变化, 另一方面, 却始终对中国政体的威权性质和社会的威权现状抱以忽视甚至无视的态度。以至于在眼花缭乱的所谓学术成果当中, 频频出现所谓“中性政府”、“集体人权”、“协商独裁”这种反民主反社会的自创概念。比之 Tilly 所分析的欧洲历史, 中国今天的威权现状显然更具迷惑性。但这种困惑似乎已经在近年来的维权行动与进步知识分子启蒙行为的合流中, 逐渐廓清。无论是牛博网、天涯社区这样的公共议政平台, 还是 08 岁末一纸石破天惊的《零八宪章》运动, 其大前提都建立在对国家政体性质和社会现状清楚无误的认识之上。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与已然存在的社会运动网络正在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频繁的冲击着封闭、保守、貌似强大的威权政治体系。

那么, 我们是否有理由对民主化转型抱持乐观呢? 相信每个人都会通过 Tilly 的传授, 得出自己的判断。

注: 本刊另一位研究员吴强博士, 曾在 2007 年 12 月在《21 世纪经济报道》上撰写过一篇《欧洲的抗争与民主》一书的书评。故而, 本人并未对 Tilly 书中所研究的具体对象解读过多。请感兴趣的读者参考吴强博士的书评。《抗争与民主: 蒂利对法、英民主道路的解读》, 吴强, 《21 世纪经济报道》2007 年 12 月 7 日, 阅读地址: [http://www.cs.com.cn/lcsh/04/200712/t20071206\\_1256786.htm](http://www.cs.com.cn/lcsh/04/200712/t20071206_1256786.htm))

(美) 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 陈周旺、李辉、熊易寒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7 月, 定价: 32 元

## 随笔

### 北岛的母语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mailto:susumartin@hotmail.com))

1976 年的某一天, 北岛在一张语文纸上写下了“我不相信”这样的诗句: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1976 年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周恩来在春夏之交死去，憋得太久的年轻人竟然奔向广场，他们站在台阶上，站在纪念碑前大声朗读自己的诗歌。我怀疑北岛就是在这样愤懑的气候下，写成了他此生最有影响力的诗篇。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历史有时候显得特别吊诡，多年前，年轻的人们选择在 5 月 4 日这一天走上街头，多年之后，4 月 5 日又成为他们奔走呼号的一天。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是年轻人内心的痛苦与屈辱却依然如当年一样醒目。那么多悲伤的人们围绕着五四或者四五这几个看上去类似的数字，夜夜流淌着愤怒或绝望的泪水。仿佛一道旧有的伤疤，每到季节，就反复疼痛。

命运注定，北岛这一代人从一开始就陷在某种反抗的情结之中，以至于他的诗歌只能以某种口号的形式上路，一直朝着那个腐败的世界呐喊。即使在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的诗篇，内心的愤怒与悲伤依然跳跃，北岛的回答也是我们的回答，尽管北岛渐老，而我们看上去似乎年轻。

但是北岛却渐渐变了，他变得不再迷恋他当年的回答。

“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这是北岛对他的青春写作的反省。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北岛的追求，作为一名诗人，他的诗歌的终极指向必须是人性，是个体，而不会是任何一种与时代有关的高呼，北岛努力挣脱一个时代对他的束缚，努力走进真正的诗歌，无疑是一种高远的品质。但问题在于，当北岛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他的诗歌，他却遇到了各个方面对他的排挤。

首先当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他的排挤，他变成了一个流浪诗人，1986 年，北岛离开祖国，开始长达十几年的欧美流浪写作之旅，他甚至成了不受欢迎的诗人，成了一个需要监控的游子。当他渐渐发现在异国他乡与乌有的意识形态风车作战的荒谬之后，他努力转向了真正的诗歌写作。这个时候，那些当年和他一起呐喊的人们，却又不干了。

可能是有人对于北岛要做一名纯粹诗人的态度有所不满，可能是有人认为北岛退缩到诗歌之中，将导致他们失去一个一同呐喊的战友。许多年以来，他们心目中的北岛，还是那个当年以组办非官方刊物《今天》，发表反叛性的诗歌而闻名的北岛。北岛的代表作应该是《回答》，北岛的名句应该是“我一不一相一信”。北岛的诗应该永远充满反抗，向往自由。

而另一拨研究诗歌、写作诗歌的人们却又站在诗歌的立场上对北岛加以否定。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李欧梵曾在给北岛诗集写的序中对《回答》这样评价：“我认为这只是几句口号，而不是诗。这几个字的挑战——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权威、反封建’的教条语境，但是纯以诗的立场来读，至少从一个外界的旁观者而言，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更多所谓后现代的年轻诗人们甚至由此打出了“PASS 北岛”的口号。

各个方面的人们聚集起来，朝北岛进攻，北岛成了诗歌领域的一只靶子。

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北岛的“诺贝尔写作”，说他只要写出诗就先送到马悦然那儿。这样的分析头头是道，说的是北



岛在海外呆了十几年，诗歌没有长进。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认为北岛出国后写的诗“基本上重复原来的意象，新的发展很少。北岛没有前进，许多中国作家也都是这样重复自己。”

人们似乎由此找到了北岛诗歌不长进的原因：北岛的诗丢掉了早期的反叛激情，把创作目标定为“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无瑞典文译本，是能否得到诺贝尔奖的先决条件。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懂汉语的马悦然说，他翻译了北岛所有的诗，北岛只要写出诗，就先送到他那儿，让他译成瑞典文。

有人甚至描述，北岛曾对旅居美国的一位中国诗人说，写作时要注意使用那些方便汉学家翻译的意象。

另一种推测由此而来。得不到诺奖基本成了定局之后，十几年来一直以“异议中国诗人”身份在海外谋生的北岛决定回国发展了。有人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了北岛的“纽约变奏”。纽约在北岛的眼里，“黑鸟盘旋，好一副末日景象”；第一次坐地铁，“我差点儿被尿骚味熏晕了过去”，并借用别人的口说，“纽约变了，以前纽约人是不谈钱的，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

北岛在文中还引述一位中国画家的话说，他和纽约流浪汉们游行抗议时，遭到纽约警察镇压，警方使用马队冲进游行队伍，“警察抡起警棍”殴打。人们还看见北岛在文中每次引用不具名的出租司机的话，都是大骂美国。土耳其的司机说“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而对没有骂美国的塞尔维亚司机，北岛则描述说，“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的心脏。”

凭心而论，北岛的这些旅途随笔的确见仁见智，但当年的战友们对北岛的攻击却由此上了一个层次，甚至把北岛看成异议作家中的“讨钱专业户”。人们认为，北岛当年出国时强调，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书桌”，他以“异议作家”的头衔，在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游走、游说。虽然十多年来从没写出什么像样东西，却获得了十几个西方基金会和大学的经济资助。北岛的成功讨钱、失败得奖，已经成为海外“异议作家”们的光辉榜样，人们隔三差五总能听到那些没有作品出产的“作家、诗人”得到某某基金会的“写作基金”。

有人引用英国作家奈保尔的话继续批评：“那些基金会的钱是给那些二流者们、那些玩艺术的人们的。永远不要接受基金会的钱，它会毁了你。任何不是你自己挣来的钱都有绳索套住你。文学基金、奖金或任何不劳而获的金钱都不能促使你创作出作品，只有真正的作家能。”

福克纳则在更早就说过：“我从未听说由于接受了慷慨馈赠的金钱而写出佳作这种事儿。好的作家从不申请基金，他忙于写作，无暇顾及。”

由此，北岛过去几十年的写作努力，在这样的批评面前，几乎就要化为灰烬。

我不太赞成这种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所谓北岛批评。无论是当年有人逼迫北岛远走他乡，还是今天有人谩骂北岛“宠物化”，都远远背弃了北岛的诗歌写作。我愿意相信，正是对家国的距离感，导致北岛开始真正脱离那种与生俱来的庞大的意识形态的笼罩，因此，先期写作的功利性和时代性得以慢慢减缓下来，真正的诗歌写作由此上场。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流亡后的北岛已经由一个战士变身为一位绅士。在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里，诗人北岛开始真正平静下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诗歌问题。比如一个人同自己的母语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流亡者对于祖国的深厚爱情问题，生活和幸福的虚妄问题，个体话语存在的可能及其难度问题，以及对本体论的怀疑和对整个世界逻辑的质疑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北岛像更多的人一样，被一种返乡的坚定和困难深深纠缠。

那气味让人记忆犹新  
像一辆马车穿过旧货市场  
古董、假货和叫卖者的  
智慧蒙上了灰尘

对老旧的北京气味的怀念，成为北岛多年来的最大梦境。北岛曾经说，刚刚出去流浪的那几年，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十三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现在，我想说，正是这种挥之不去的北京气味，才是北岛最大的母语环境。他回来，他写作，与其解释成北岛对过去

自由呐喊的某种放弃，解释成对当下主流强权的妥协，不如理解成他对诗歌环境的个人化回归。北岛只是一个诗人，而不可能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他的一生，为诗歌而来，也为诗歌而往，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与北岛无关。真正的北岛，只有逃离各种意识形态的陷阱，才有可能写出他自己满意的诗歌。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